

哲学史

29 弗朗西斯·培根

惠顿学院亚瑟·霍姆斯博士著

好了，我们开始吧？嗯，我想我已经…… 本周我布置的阅读材料是《培根与霍布斯》以及《霍布斯思想概要》。今天上午和下午，我想让我们重点讨论培根，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讨论的内容。

也就是说，现代哲学史可以用两条思想路线的交汇来概括。一方面是英国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是欧陆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两种传统分别代表了当时科学归纳方法在所有研究领域的扩展，以及笛卡尔即将提出的演绎数学方法。

因此，我们将追溯这两种思想流派的发展历程，首先从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17世纪的英国）开始。首先，弗朗西斯·培根阐明了他的目的和方法。他的总体目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明显。

在关于培根的大量二手文献中都有提及。但在像斯图姆夫这样的教科书中，这种仅用一章篇幅概括的论述却往往被忽略。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追溯世界观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培根与中世纪的基督徒一样虔诚，但他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培根的母亲是一位信奉改革宗神学的清教徒。培根的思想和整体目标中都带有这种清教徒的影子。

他在《创世记》开篇几章中反复提及所谓的文化使命，即赋予亚当和夏娃繁衍后代、治理万物、管理牲畜等等的使命。他抱怨说，人类非但没有履行这一使命，反而被各种事物分散了注意力。

人类因神恩而拥有的对自然的权利。因此，他像许多改革宗思想家一样，从创造、罪和救赎的角度来思考哲学、科学和理智的任务。创造赋予了我们使命。

罪恶使我们偏离了使命。救赎召唤我们回归。这就是他所使用的神学框架。

但他所谴责的特定罪恶以及他所抱有的特定救赎希望都与哲学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他认为经院哲学家是使人类偏离文化使命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原因在于，经院哲学的争论对丰富人类生活、通过人类知识改造社会等方面都毫无助益。

相反，他想要的并非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贫瘠——那种令他厌恶的贫瘠——而是一种新的途径，一种新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投入到改造自然和塑造人类社会的任务中。换句话说，中世纪的人把哲学视为神学的辅助工具。

也就是说，哲学被视为神学的仆人、辅助者或服务者。哲学服务于神学的任务。而培根的做法是，他把哲学视为社会的仆人，而不是神学的辅助者。

你看，他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努力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的确，16世纪末，也就是伊丽莎白时代，是乌托邦的时代。你看，那正是乌托邦的时代。培根本人也曾写过他梦想中的科学乌托邦。

也就是说，乌托邦是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即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改造现状而实现的。他所设想的每个人都在为之奋斗的，正是这种改造后的社会，他称之为天国，上帝的国度。因此，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乌托邦理想，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特征。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科学能够实现这一希望。你看，就是现代科学。当然，我们不要妄下结论，认为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会自动产生好的结果。

他一路发表了一些伦理方面的评论。很明显，正如他所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他著名的格言），但他希望这种力量受到恰当伦理的约束。你看，如果没有植根于经院哲学传统的自然法伦理，他就没有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这种伦理必须源于他所说的“真正的宗教和正确的理性”，这听起来很像奥卡姆的威廉。

真正的宗教是神的诫命。正确的理性，即意识到后果后产生的审慎。真正的宗教和正确的理性。

如果你带了这本选集（我假设你带了），这是新版选集，从培根的作品开始。哦，你是说你没带？好吧，下次吧。

好的，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些人，真是勇敢，带了旧书，有些人带了新书。不管怎样都带上，我们需要整本。对了，在第20页，哎呀，我带错书了。

旧的那只。借我一下，珍妮尔，我可以借你的吗？我对着镜子说。好的。

在培根选集的最后，也就是第20页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将人类的野心区分为三种类型或等级并无不妥。第一种是那些渴望在本国扩张自身权力的人。

这是自私自利的那种。哪种才是庸俗堕落的呢？所以他并非道德上的利己主义者。第二种是那些致力于扩张本国权力和统治范围的人。

现在，这当然更有尊严一些，但贪婪的本质却丝毫不减。这就是企业利己主义。如果你了解英国历史，就会明白这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来说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人类自身对宇宙的权力和统治，那么他的野心——如果可以称之为野心的话——无疑比其他两种野心更有益、更高尚。而人类对宇宙的这种权力，就是对整个宇宙的统治，你看。这就是培根的动机。

你或许读过一些文献，或者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培根的这种强调实际上赋予了现代科学剥削自然、支配资源和环境以谋取私利的权力，以至于我们当今的环境问题有时会被归咎于弗朗西斯·培根。坦白说，我认为这种指责培根的方式忽略了他当时的思考背景。因为当你深入阅读培根的著作时，你会很清楚地发现，他并非在思考支配，而是在思考一种符合上帝之国精神的管理方式。

所以这完全是两码事。这并不是说培根的影响没有给人们带来创作自由，而是说那并非培根本人，而是人们断章取义地解读培根的作品。

那么，他究竟想用什么方法呢？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让人掌控自然进程？答案显然是对自然进程的了解。对自然进程的了解。除非你注意到他措辞中的微妙之处，否则他的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误导。

一方面，他否定了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他并非中世纪意义上的实在论者，即相信普遍存在的实在论者。他否定任何形而上学的形式。

如果存在最终原因，也就是说，自然界中存在目的，那么，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神学家们去探讨了。这无法通过理性或经验的手段来理解。因此，他没有转向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转向了经验科学，一门旨在发现本质形式的经验科学。

如果你不仔细理解，可能会把“形式”的第二个含义误认为是第一个含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形式”的第二个含义指的是自然过程的统一规律。也就是说，当A之后总是发生B时，你就得到了自然过程中的这种行为形式，而他想要的是一种能够捕捉到这种方法。

这种形式与完全由物质世界中物理力作用所导致的各种过程有关。在这方面，他最赞赏的哲学家，正如你所预料的，是随着机械论科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希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他主张一切都用物质和运动来理解。当然，在他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家无疑是伽利略，他的思想也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他的目的。

他的方法，即一种经验性的形式科学，正是我们将看到的，使他致力于发展合适的归纳方法，即归纳逻辑，而非演绎推理。我还要补充一点，他在批判演绎推理时，对三段论所能证明的内容却缺乏足够的认识。问题不在于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本身。

问题不在于逻辑法则。他太聪明了，不会受逻辑法则的束缚。问题在于找到前提。

你还记得吗？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冗长的开篇中所指出的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论证的第一原则？柏拉图认为可以通过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第一原则无限倒退或关于第一原则的循环论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能够凭直觉从我们对整个物种的累积经验中抽象出第一原则，即物种的形式。

培根不喜欢的正是这种直觉式的抽象过程。他曾在某处谈到，不恰当且仓促的抽象概念会使三段论推理失效。例如，亚里士多德从物种中抽象出形式。

他对此不以为然。然而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称这一过程为归纳法（通过归纳法我们认识理念），而培根也称这一过程为归纳法（通过归纳法我们认识理念）。

但是，由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形式归纳，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通过直觉抽象进行的归纳，是不准确、不充分且不够精确的，他显然希望用另一种归纳方法来处理第二种意义上的形式。所以要注意他的用词。我认为这是他文学技巧的一部分，他确实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人物。

但你看，这是他文学技巧的一部分，他谈论形式，用归纳法来认识形式，这虽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但概念却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他改变了，改变了知识的对象，也改变了认识的方法。正是通过认识这个新的知识对象，并运用新的方法，才能获得力量。

他认为，用旧方法研究旧知识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并不能使人掌控自然。因此，他所追求的是一门研究物质世界力量的经验科学。如此看来，知识的价值在于其工具性。

他追求的并非真理本身，也并非理解本身。他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把通往真理的道路视为通往沉思上帝的阶梯。他也不把通往真理的道路视为沉思上帝的途径，沉思各种形式，最终升华到沉思万物之本源——至善。

不，那不是他所理解的存在等级，也不是他的世界观。他认为上帝是创造者，但我们在自然界中的责任，是为了上帝的国度而履行这一创造使命。

现在，如果你能记住这个思路，让我再补充一点更具前瞻性的历史背景。关于培根，我们真正需要掌握的关键主题只有两三个。其中之一当然是他的归纳法概念。

第二点是，知识就是力量，它与驾驭自然的力量，即创造的使命，息息相关。但第三点是，这种科学知识可以完全客观的假设。科学知识可以完全客观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告诉我们的是现实，而非普遍真理的现实主义，而是科学知识的现实主义。他将这种强调传递给了启蒙运动，并在下一个世纪，即18世纪的苏格兰现实主义中得到了最有力、最具影响力的体现。在苏格兰现实主义中，无论是像托马斯·里德这样的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我们稍后会提到他），还是近十年来关于苏格兰现实主义的著作，都不断地提及这种联系。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苏格兰现实主义的兴趣有所复苏。马克·诺尔就是通过他对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和著述，重新唤起人们对苏格兰现实主义兴趣的人物之一。

但提到苏格兰现实主义，人们总是会想到培根的科学观。培根式的科学。也就是说，完全客观的科学，纯粹经验的科学，没有任何预设的科学。

科学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客观的、经验性的科学告诉我们，就像它告诉任何人一样，关于自然的现实。在苏格兰现实主义传统中，人们逐渐相信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共同知识基础，在此基础上，一种文化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上层建筑，进而发展出哲学神学、护教学等等。

对于一些对神学和护教学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体现在普林斯顿，尤其是威瑟斯彭担任普林斯顿学院院长之后。因此，普林斯顿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成为了苏格兰现实主义思想传入美国的渠道。19世纪60年代的古典长老会神学家查尔斯·霍奇，其整个神学体系都建立在培根式的基础上，他认为科学告诉我们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等等。

这种影响非常广泛，惠顿学院也不例外。比如说，第三任校长J·奥利弗·巴斯韦尔就是一位坚定的苏格兰现实主义学者。他是一位哲学家和神学家，对苏格兰现实主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这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本科就读于惠顿学院时，正是通过苏格兰现实主义的视角接触到了哲学。

并非因为我曾师从第三任校长，尽管我的老师也曾在第三任校长门下学习，只是后来去了别处任教。因此，苏格兰现实主义中的培根思想影响了美国福音派

思想。如今，我认为这种影响在福音派信徒中已大大减弱，除非你去阿斯伯里学院和神学院，那里培根思想是主导的哲学思潮。

有趣的是，苏格兰现实主义的复兴更多地体现在当代美国认识论中，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好的，那么关于培根，有三点需要记住。

好的。第一种方法是归纳法，旨在了解事物的形式。第二种方法是科学的客观性及其对苏格兰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

第三点是，科学知识只有工具价值，而不是探求真理和思考上帝的一部分。好的。现在，为了把握他思想的整体精神、目的和背景，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分析一下。

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两点：一是他所作所为的负面、批判性的一面，二是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一面。他所批评的是他所谓的“偶像”。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宗教隐喻。

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东西，就像奉若神明一样。它们是人类思想中非科学的影响因素，必须加以驱除和清除。他指出了四种偶像：部落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院偶像。

部落的偶像与人类思维的影响有关，或许是无意识的影响，尤其与我们所认为的第一原则有关，而这些原则却缺乏充分的保障。这里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存在一些根植于人性统一性的知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如同自然法则，而他所摒弃的正是这些部落的偶像。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天知识。

从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中，无法推导出基本原理。他所摒弃的部落偶像，以及你正在阅读的这些选段，将为这些观点增添血肉。洞穴中的偶像与个人气质有关，也就是说，与你身处洞穴之中、影响你思维方向的个人氛围有关。

这是他想彻底摆脱的东西。我想，如果他听到威廉·詹姆斯或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900年前后说的话，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詹姆斯谈到，心性温柔或坚韧在哲学上会产生差异，因为你的心理倾向会影响你的哲学观。心性温柔的人更有可能持有乐观的自然观。

意志坚定、抱持宿命论和悲观主义观点的人，或者像弗里德里希·尼采那样，探讨权力意志——即与弱者意志对抗的强势意志——如何影响人们的哲学观点。因此，基于此，尼采本质上是在运用一种种族主义心理学。

民族心理学，即种族心理学、人民心理学。它将尝试从民族的心态和气质出发，来描述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的哲学观点。因此，洞穴偶像与个人或群体的气质有关。

我刚才看到这边有人。是谁？克里斯汀。我想知道“部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山洞是不是……柏拉图思想的回响？没错，的确如此。非常像。你看，我们都被困在自己的山洞里。

既然情绪气质似乎部分是由生理因素造成的，那么洞穴本身也造就了其自身的情绪气质。我想他这里所说的“部落”指的是整个人类，指的是人类的身份认同。

就是这样。没错。所以你的怀疑是对的。

集市上的偶像。当然，在17世纪的城镇乡村，集市日是所有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各种八卦流传的地方。

语言正是在那里形成的。这种语言传达各种各样的思想，无论这些思想是否出于本意，也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就此而言，他实际上是在说，语言的习语有一种方式，能够灌输一些可能完全错误的哲学信念。

例如，如果我们把名词理解为代表事物、实体或物质，那么我们就赋予了所有被名词指称的事物以实质性的现实意义。想想看，这种做法把柏拉图等人的形而上学引向了何方？一无所获。

所以，市场上的偶像，剧院里的偶像，没错，在那里，我们虚构的游戏变成了现实，拥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在那里，我们的想象思维被认为是真实的。

所以，戏剧确实与哲学、科学等等有关。他区分了三种哲学：诡辩哲学、所谓的经验哲学和迷信哲学。但他使用这三个术语的方式——不仅仅是其中两个，而是全部三个——都令人遗憾。

他以亚里士多德为例，批判诡辩哲学。正是在诡辩哲学中，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仓促抽象出的原则破坏了通过三段论推理得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

经验哲学指的是当今某些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缺乏细致的观察、严谨的检验和实证研究。他指的是吉尔伯特的工作，吉尔伯特曾进行过一些关于磁学、磁石等方面的原始研究。迷信哲学则是将哲学与宗教混杂在一起。

哲学与宗教的混合。他指的是像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样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赋予宗教色彩，使他们的哲学最终导向某种神秘的宗教。他更喜欢德谟克利特。

现在，你看，当你审视这些批评时，就能明白他对过去的否定是多么彻底。我周五提到过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主义的复兴。这种怀疑主义既包括对过去哲学的质疑，也包括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质疑，例如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的重新发现、中世纪综合哲学的瓦解、新教改革留下的认识论真空等等。

你看，培根在这里重现了对过去哲学的怀疑态度，想要重新开始，就像宗教改革家们回归“唯独圣经”（*scriptura sola*）一样。所以，培根想要回归纯粹的经验事实。但请注意，他并不像中世纪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与宗教之间存在任何积极的联系。

哲学与宗教探索在此融合，哲学与神学融为一体。培根并非如此。他的思想也绝非科学与宗教的结合。

宗教对科学的唯一影响在于它告诉你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为什么？因为科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价值。它能帮助你完成文化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本应有的状态，等等。

所以，与宗教相关的并非科学的内容，而是科学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嗯，我刚才提到了伽利略。

你看，伽利略就深受那些试图将科学内容与宗教融合起来的人的迫害。这就是他陷入困境的原因。而在培根时代的英国，也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宗教迫害由来已久。

你对那段宗教史有所了解吗？宗教改革爆发于亨利八世时期，他本人对路德颇有研究。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女儿玛丽继承王位，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于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就此展开。

嗯，中间有一段空档期，他的儿子爱德华，一个年轻的国王，在位时间不长。然后是玛丽。

然后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是新教徒。你看，风水轮流转了。伊丽莎白之后是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是天主教徒。

你看，这就是君权神授。然后是查理一世，他因此丢了性命。所以，那是一个宗教斗争和宗教迫害的时代。

培根似乎非常渴望（或者至少乐于）做的，就是将宗教与哲学和科学充分区分开来，从而使科学家或哲学家免受那些因宗教原因而迫害他们的人的侵害。他不想成为另一个苏格拉底，饮鸩自尽。当然，在那个年代，人们并不真的会饮鸩自尽。

他们用斧头砍的，而且确实有斧头。对了，你去过伦敦塔吗？我记得我们去伦敦塔的时候，孩子们一个六岁，一个八岁，都是寸头。我们穿过吊桥进入塔内时，我记得那个穿着制服的食肉者把手放在我们其中一个孩子的寸头上，说：“小心你的脑袋，他们把他们的脑袋扔得到处都是。”

这就是苏德在伦敦塔受到的“欢迎”。没错，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置反对派的。所以我认为，培根之所以进一步主张将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哲学分离，从而提出主观科学和预设科学，还有另一个原因。

宗教与科学的唯一联系在于它赋予科学的目的。好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的归纳法，也就是它的积极方面。他在这里所做的，是提供他所谓的某些表格，也就是整理研究结果和观察记录的方法。

你会发现斯图姆夫在第224页谈到了这一点。他提到了存在表、缺失表和程度表。如果你熟悉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归纳法，你会发现它们与这些概念相关。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称之为“一致性表”、“差异表”和“伴随变化法表”，本质上它们是一样的。而它们实际上都是非常简单的实验方法。如果你试图找出现象 X 的原因，并且发现 ABC 先于因素 X、Y、Z 出现，而且类似的情况反复出现，那么基于一致性，你很快就会开始怀疑 C 和 X 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合理吗？另一方面，如果你发现虽然 ABC 是 X、Y、Z 的前因，但当 C 不存在时，X 也不存在，那么基于差异，你同样会开始怀疑它们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如果你发现随着C含量的增加，X度数也成比例增加，那么就再次证实了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方法。我们如何获得金属的线膨胀系数呢？你看，通过加热，我们可以确定该金属相对于其他金属的相对线膨胀系数。

所以这很简单。但要注意，当你发现A与X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你就能通过控制A来产生X。明白了吗？因此，你也就拥有了控制自然的力量。

非常非常简单。就现代科学方法而言，它非常有限。它没有假设的概念。

假设在指导实验中的作用。没有概念模型的概念。只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范式和范式转变。

并非如此。实验方法非常简单，毫不复杂。但弗朗西斯·培根正是现代经验科学方法的开端。

嗯，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培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曾深度参与英国政坛。

据说他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担任过英格兰大法官？詹姆斯一世时期？是的，他曾试图谋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高级政治职位，甚至不惜耍手段。最终只得到了一些低级官职，但在詹姆斯一世时期，他的境遇要好得多。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趣、非常引人入胜的人物。

你现在说的是哲学方面。但他似乎并没有怎么搞哲学。他对科学更感兴趣。

是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补充两点。第一，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科学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相对较晚。正因如此，任何学科的人都可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都被称为自然哲学。

在英国大学、美国大学，以及我们惠顿学院，如果你翻阅以前的课程目录，你会发现自然哲学。所以，学科之间的界限远没有以前那么清晰了。

直到19世纪，有些情况则更晚。另一方面，培根的著作在两个方面具有真正的哲学意义。一是它标志着现代科学哲学的开端。

也就是说，关于科学本质的哲学思考。好的。其次，是关于正在发生的世界观转变。

他明确地划分了过渡时期，奥卡姆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而培根则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这一点非常清晰。他的观点是什么？相当赞赏。

我尝试在我阅读过的资料中寻找任何明确提及奥卡姆的地方。我没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任何相关内容。不过，他本来就不常引用别人的话。

是的，奥卡姆的思想。一位名叫克伦比的英国科学史学家试图证明，培根的这些表格和方法，早在威廉·奥卡姆的著作中就以非常相似的形式出现过。而且别忘了，我刚才指出，他在伦理问题上的诉求与奥卡姆的诉求本质上是一样的。

现在，我对培根的理解中一个不太清楚的地方是，他在普遍概念方面是否属于奥卡姆主义。也就是说，他是术语主义者、名义主义者吗？还是概念主义者？当然，他没有涉及任何抽象概念。但他似乎并不否认神学家处理抽象概念的特权。

如果他是唯名论者，他就会否认神学家有可能处理抽象概念。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更倾向于概念论，但他仍然深受奥卡姆的影响。我记得没错的话，当他还在剑桥的时候，奥卡姆的理论非常流行。

事实上，我可能记得确切日期，让我想想，嗯，当他1577年以学生身份进入剑桥大学时，奥卡姆的学说非常受推崇。经院哲学方法虽然仍在研究，但已不再流行。25年前，在牛津大学，邓斯·司各脱的著作曾被公开焚毁，以示对经院哲学方法和经院哲学争论的否定。

当理论发生转变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把所有东西都烧掉。何必让图书馆堆满书籍呢？现在他们干脆把书卖给学生。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奥卡姆的影响非常明显。是的，没错。好的，你还记得我在这里用归纳法作为方法，用形式作为知识对象吗？

亚里士多德运用一种归纳法来试图获得他所理解的“理念”的知识。培根则运用另一种归纳法。结果恰好是A和B，不是吗？同样是为了获得他所理解的“理念”的知识。

因此，认识方法的方式与认识的对象是相关的。这符合我们的预期。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这样。

如果形式存在于某种超越的领域，那么你就拥有了掌握超越性的知识。研究经验案例对你毫无帮助。因此，你需要运用辩证法，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去探究抽象概念。

如果形式蕴含于具体事物之中，那么你就要尝试将它们提取出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抽象归纳法。如果不存在真实存在的形式，而你只是在深入研究具体事物，那么简单的经验方法就能奏效。

培根。这么说确实很诱人。而且我承认，我第一次读培根的作品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读培根越多，就越觉得并非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太了解光谱另一端的实用主义了。比如说，如果你谈论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你会发现，当我们讨论杜威哲学的第二阶段时，我们读的就是杜威的《哲学重建》一书。

我认为他在第一章或第二章就谈到了培根。他声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他自己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

但其中涉及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你看，培根是基督教有神论者，他认为知识是神圣的使命，可以服务于上帝的国度所特有的目的。

杜威是一位彻底的进化论自然主义者，他认为实验思维是解决威胁生存的问题的途径。你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杜威还将他的实验思维延伸到了伦理学领域。

培根？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他讲道理。

但这似乎是一种深受古典观念影响的谨慎态度。文艺复兴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他显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影响。

大卫？是的。哦，是的。因为他的方法提供的是关于A和B之间因果关系的经验概括。就像我举的例子一样，C和X之间也是如此。

是的，绝对是。丹？培根是否觉得有义务回答柏拉图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对游戏的真实性、游戏的变幻莫测以及他们所说的感官欺骗方式的质疑？他觉得有义务回答关于感官知觉相对性的问题。

他的回应是，他的方法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相对性，通过增加我们获得普遍知识所依据的实例数量来实现。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例子是错觉还是相对的，那么你可以再看看其他例子。

科学观测结果的可重复性至关重要。所以关于相对论，他认为他有一些方法可以验证它。我不知道他是否论证过物理物体的真实存在。

除非是指他所谓的迷信哲学。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指的就是某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那种超脱尘世的沉思。但他对这种沉思的批判本质上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相同，即当你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时，沉溺于这种虚伪颓废的思想令人作呕。

所以他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用辩证法来反驳柏拉图。他的出发点始终是创世的旨意。并且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他选择摒弃而非反驳。

你明白吗？大卫？抱歉。那他对那次坠落有什么看法？嗯，我猜他的看法跟你差不多。总之，那是一件坏事。

他认为堕落的故事是历史性的。他对人类罪性的看法与任何一位改革宗思想家的看法大致相同，即认为罪性是全然的，因为它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全然堕落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坏的或错误的。

我指的是，他是否思考过人类的堕落、自然法则以及我们如何获得经验科学。他没有讨论这种可能性。他确实谈到了人类的疏离如何导致事物失控。

通过自身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的。